

西汉时期的水患与人水关系:基于陈持弓事件的初步考察

卜风贤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建始三年误入宫室的陈持弓本事,引发史家诸多解读。本文结合西汉时期的水患形势和人水关系变化情况,对陈持弓事件的发生发展予以梳理考察。陈持弓事件看似偶然,但在其发生过程中有一定必然性。陈持弓事件与长安惊恐乱象之间并非直接的线性进程,而是西汉建始三年长安惊恐过程中的一个另类注解。西汉时期的人水关系,既有兴水利协理水力造福于民的方面,也有水患频发、水力肆虐、为害百姓的方面。西汉时期人水关系的演变基本呈现三个阶段:武帝以前人力胜于水力,水利兴盛;昭宣之时人水关系愈趋缓和,人水协理势均力敌;元成以后,水力暴涨,人水关系失去平衡状态,水害肆虐,闻水色变而长安惊恐。也因为这个原因,陈持弓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建始年间长安城中自有女孽入宫的必然性。

【关键词】陈持弓事件;人水关系;水利史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6-0055-10

Flood Disaster and Human-Flood Relationship in West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Chen Chigong Event

BU Feng-xia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Chen Chigong Event that mis-involved into imperial palace in Jianshi three years, initiated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ical experts. Combined with the flood disaster situation in West Han dynasty and human-flood relationship change, this thesis do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en Chigong Event. This event was seemingly accidental, however, it had the necessity in its occurrence process. This event had no direct linear process with Chang'an fear revolt, but it was an alternative anno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ang'an fear revolt in Jianshi three years of West Han dynasty. The human-flood relationship in West Han dynasty not only had the benefit to the human race with irrigation construction, but also had the aspects of harmfulness with flood frequency. Human-flood relationship change in West Han dynasty took three steps, irrigation prosperity and human race better than irrigation before emperor Wu, Human-flood relationship tended to mitigation in Zhaoxuan periods, human-flood relationship off balance and disaster made fear in Chang'an city after Yuan-Cheng periods. As for these reasons, Chen Chigong event was seemingly accidental, but in fact, it had the necessity of women sinner into palace in Jianshi periods.

Key words: Chen Chigong Event; human-flood relationship; irrigation history

西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帝都长安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年方九岁的小女陈持弓冒入未央

【收稿日期】2016-07-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灾害环境与城乡发展的历史研究”(16JJD770029)

【作者简介】卜风贤(1966—),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史、农业灾荒史。

宫阙,引发后世治史者许多解读猜疑^①,其中既有文献记载的舛误,也有史家认识的偏差^②。近年来王子今等人专门研究了小女陈持弓事件并基本廓清了其过程^③,即先有“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余所”^④,而后出现陈持弓事件,“七月,虬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⑤最后引发皇帝下诏布告天下,“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⑥

但在随后的推论中,王子今等以为陈持弓事可能是“吏民惊上城”以致“长安中大乱”情形之导因^⑦,此论则大有可商榷之处。因为无论《五行志》还是《帝纪》均无明确记录言及陈持弓闯宫与长安惊恐之间的直接关联,从逻辑关系推断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陈持弓阑入宫门,即使被发觉,也是宫中人事,如果陈持弓入宫导致长安城乱的话,则应是宫中先乱而后城乱,但《汉书·王商传》记载:“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臣皆从凤议。左将军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显然,宫中惊慌源自城中百姓惶恐。而且,成帝议政过程及下发诏书中皆专注于水害讹言,并未提及陈持弓一事,足见陈持弓本事与宫室扰乱属于两类事件,并非直接相关或者因果关联。

此外,《汉书》之所以记录陈持弓事件,也有其史书意向,志怪录异附会类比以警示帝王,即“女孽入宫”^⑧,其咎在于后宫及外戚擅权^⑨。所以,陈持弓阑入宫阙与长安城民众恐慌事件之间并无必然逻辑关系,但在事件演进过程中可能具有类似的社会背景,即西汉成帝三年夏的三辅水灾,数千人死于水患,难免人心惶恐,由此导致长安城乱。也可能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上小女陈持弓误打误撞阑入未央宫,本是一个孤立事件,后来被牵强附会于城乱讹言事件之中,遂被混为一谈。《汉书》之外,《前汉纪》等书对此多有转载和评述,事件主体虽然只是一个九岁小女孩,但因为事件的时间、地点具有特殊

① 陈持弓闯宫一事,首见于《汉书》卷10《成帝纪》、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七下之上》、卷75《李寻传》、卷97下《外戚列传第六十七下》。《成帝纪》按照关内大水、陈持弓走入未央宫、吏民惊恐上城的事件顺序予以记录;《五行志》按照京师流言惊恐、陈持弓入宫的时间先后述说阴阳“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小女而入宫殿中者,下人将因女宠而居有宫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戩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而在《李寻传》中则将陈持弓入宫置于朝廷惊慌之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外戚列传》则在讹言相传惊恐之后引出女童入殿之事,附比内宫。此后《汉纪》、《三辅黄图》、《开元占经》、《史通》、《西汉年纪》、《通志》、《文献通考》、《关中胜迹图志》、《历代帝王宅京记》、《肇域志》、《日知录》、《(雍正)陕西通志》、《读书杂志》、《(乾隆)西安府志》等文献中均有或多或少的人事引述和议论发挥。

② 《通志》卷5下《前汉纪第五下》明确认定陈持弓因为大水传言而于慌乱之中冒入宫门:“秋,关内大水。七月,虬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

③ 王子今、吕宗力:《论长安“小女陈持弓”大水讹言事件》,《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

④ 《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

⑤ 《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

⑥ 《汉书》卷10《成帝纪》。

⑦ 王子今、吕宗力:《论长安“小女陈持弓”大水讹言事件》,《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

⑧ 《汉书》卷75《李寻传》。

⑨ 《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是时,帝母王太后弟凤始为上将,秉国政,天知其后将威天下而入宫室,故象先见(现)也。其后,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权,至莽卒篡天下,盖陈氏之后云。京房《易传》曰:‘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无)人,司马死。’”

性,故此几乎成为一宗历史公案。

陈持弓事件不论是从灾害、谣言,还是儿童神秘象征的角度去研究,都不能孤立于西汉时期社会文化背景之外^①。而在《汉书》之《成帝纪》和《五行志》中,小女陈持弓事件都与京师水灾牵连在一起,因此有必要考察西汉时期的人水关系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以至于成帝时期遇水惊恐几可扰乱朝政。

一、高祖、文景及武帝时期的人水关系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汉初以为秦祚短暂,不属于正统王朝,故汉遵水德而尚黑^②。武帝时以秦为正朔,继命土德^③。汉末王莽建立新朝,又采用刘向、刘歆五行相生理论,改定汉朝属于火德。从五德终始关系看,似乎汉代从立国之日起,不论汉初的遵奉水德、还是武帝以后的土德坐大,水土交融已然成为西汉定势,汉人与水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之紧密关系^④。

汉兴以后,五行灾异学家逐渐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董仲舒以《春秋》说灾异,以五行灾异变化附比人事,“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⑤。水灾水害也因此成为国家安危的解释工具。在五德终始和五行灾异的双重影响下,汉人与水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抽象配比关系,也有国家治理方面维系社稷安危的因果关系,还有涉及国计民生的水利水害关系。因此,先秦时期“天垂象,见吉凶”(《易·系辞上》)、“日月吉凶”(《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天象符命系统”沿用到西汉初期已然失去固有效力,休咎征验转而求助于更为直观的水旱风雨等自然地理因素,天象符命之外,又出现了一套新的“地象征验系统”——天地人三才关系中,西汉时期也遵奉灾异天降、天谴灾异的本源认识,但上应于天的灾异落地生根后,已经渐渐退却了天象行迹并呈现出全新的水旱风雨虫螟等地理表象,水则是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春秋繁露》卷14《五行变救第六十三》大谈水旱饥荒、风雨雾雹、疾疫等灾异与金木水火土五行变异之间的对应关系:木变则春多雨,火变则民疾疫,土变则大风至,水变则春夏雨雹,金变则霹雳大作。“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⑥。因为水下行于地而上应于天,力求维系人水关系和谐也成为西汉时人的理想追求,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则是最根本的天人通道和人水介质。“寡功节用,则民自富。如是则水旱不能忧,凶年不能累也”^⑦。

《史记》卷29《河渠书》发凡起例专讲水利,提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重大命题。《河渠书》从禹治洪水讲起,既有“水行载舟”之便利,也有“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的感慨。因此,兴利除害也就成为汉代人水关系的基本策略。汉承秦祚,不但继承了秦的疆土政治,也继承了秦的沃土关中。秦汉时

① 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韩静:《汉代成人视角下的儿童神秘象征》,《青春岁月》2013年第10期。

② 《史记·张丞相列传》:“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6月)中指出汉初遵奉水德,是因为当时人们以为秦汉水德可以并存而不相妨。

③ 武帝太初元年改制,兼取三统说与五德说之中的服色正朔,而定为黑统土德。《汉书·郊祀志》云:“太初改制,而倪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④ 学界对五德终始与汉代政治的关系多有研究,有人以为汉初承继水德有别于秦,体现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见王绍东、张玉祥:《五德终始学说中的水德与秦汉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⑤ 《春秋繁露》卷8《必仁且智》。

⑥ 《春秋繁露》卷14《五行变救》。

⑦ [汉]桓宽:《盐铁论》卷6《水旱》。

期关中的富庶,主要得益于水利开发。《河渠书》:“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疲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自关中立国直至武帝时期,人水关系方面基本处于大获其利阶段。这与武帝水利治国的理念不无关系。武帝大兴水利,穿漕渠、“三岁而通”,“大便利”^①。又河东渠田,通褒斜道,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可见武帝水利大略。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轺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②。通过水利建设,关中地区农业生产进入深度发展阶段,农作产量水平提升^③,人口数量增加且接纳数以万计的外来移民,长安城市建设也有很大发展^④,形成了以京师长安为中心、陵邑和上林苑构建的直辖区、三辅县邑组成外围区的大都市圈^⑤。“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⑥

武帝以前也有水灾水害,但水灾数量不多,即使危害性很大的水灾,也会在治水过程中得到有效控制。高后三年(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⑦高后四年(前184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⑧高后八年(前180年)“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⑨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四月,齐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发大水,溃出。”^⑩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⑪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⑫《史记·河渠书》对此水灾的记载更为详细:“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汉水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⑬景帝前元六年(前151年)“冬十二月,雷,霖雨。”^⑭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六月“天下大潦。”^⑮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⑯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⑰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廩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於关以西,及充

①《史记》卷29《河渠书》。

②《史记》卷29《河渠书》。

③卜风贤、张琳:《汉武帝经营关中水利的意义》,《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④喻曦:《西汉京畿地区城市规模初探》,《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3期。

⑤喻曦:《西汉首都圈结构刍议》,《中国古都研究》总第二十五辑,2012年。

⑥《汉书》卷24《食货志》。

⑦《汉书》卷3《高后纪》。

⑧《汉书》卷27《五行志》。

⑨《汉书》卷3《高后纪》。

⑩《汉书》卷27《五行志》。

⑪《汉书》卷27《五行志》。

⑫《汉书》卷4《文帝纪》。

⑬《汉书》卷27《五行志》。

⑭《汉书》卷4《景帝纪》。

⑮《史记》卷11《景帝本纪》。

⑯《汉书》卷6《武帝纪》。

⑰《汉书》卷6《武帝纪》。

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①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②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③“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④瓠子塞决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⑤

在武帝以前时期,水灾最严重者为发生在元光三年的瓠子决河,直到元封二年才堵塞决口,在山东梁楚等地泛滥二十余年。“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⑥但是即便如此严峻的水害形势,也没有造成京城大恐慌,而且在武帝亲临决河之后,毅然决然塞决瓠子,一举成功,筑宣房宫以示庆贺。瓠子河决以前,也有洪水灾害冲毁房舍、流杀人民,但也没有造成社会恐慌。武帝之前,山东等地多处遭受水灾,灾情不可谓不严重,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烈景象,但是京师长安依然秩序稳定,社会安宁,在历史灾害的区域风险方面关中地区具有天然区位优势,灾而不荒、灾而不害^⑦。武帝以前时期水灾形势与三辅京畿地区的安稳局势,无不显示西汉初期的人水关系相对平和,在平和表象之下则是人力胜过水力的比拼较量。

文景武帝时期人水协理,人占上风,水旱为害却不能肆虐天下,水利遍地尽可以造福于民。不但关中水情安稳,天下江河水系也鲜有四处乱流和淹没城池的重大灾情,这种安流局面与此时汉帝勤于政事,专心内政不无关系。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针对严重的水旱灾情,颁布诏令,敦促群臣议论对策。“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⑧武帝时期大兴水利,造福于民,《汉书·沟洫志》载武帝诏令:“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内史为京畿重地,秦时引泾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于是关中为沃野”^⑨,武帝又建设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轺渠、成国渠、蒙茏渠、漳渠、漕渠等灌溉工程,一举开创关中地区水利新格局并奠定其“基本经济区”的重要地位^⑩。

二、昭宣时期的人水关系

昭宣二帝之时人水关系愈趋和缓,水害事件不但很少,也没有类似瓠子河决那样的大洪水出现。从《汉书》记载水灾情况看,昭帝、宣帝二帝数十年间(前87年—前49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洪水灾

①《史记》卷30《平准书》。

②《汉书》卷6《武帝纪》。

③《史记》卷28《封禅书》。

④《汉书》卷6《武帝纪》。

⑤《汉书》卷29《沟洫志》。

⑥《汉书》卷24《食货志》。

⑦卜风贤:《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灾害变化与灾荒关系》,《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

⑧《汉书》卷4《文帝纪》。

⑨《史记》卷29《河渠书》。

⑩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人民出版社,2004年。

害见于《帝纪》和《五行志》中。昭帝始元元年(前 86 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①昭帝元凤三年(前 78 年),昭帝发布救灾诏书:“乃者民被水灾,颇匱于食,朕虚仓廩,使使者振困乏。”^②

昭宣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③,“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④,史称“昭宣中兴”^⑤。在振兴汉室大业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一项重要举措。河湟水利开发促使农区大为扩展,农牧界线西移到临羌一带^⑥。宣帝神爵元年(前 61 年)将军赵充国在湟水流域屯田垦殖,“缮乡亭,浚沟渠”^⑦,垦田两千余顷,利用湟水灌溉^⑧。从考古所见悬泉汉简中,也可看到昭帝宣帝元帝时期西域屯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情况,轮台、渠犂屯田卒数以千计,农田灌溉渠道也有相当规模,渠长可达 100 多公里,伊循屯田、赤谷城屯田、车师屯田等地的水利开发也有相当发展^⑨。黄河中下游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也渐次扩展,“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埶皆邪直贝丘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⑩

有赖于此,昭宣二帝时期水害偃然而水利天下。西汉时人虽然依赖灾异感应的解说体系理解水旱灾害,但对政治清明与水利水旱之间的对应关系已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⑪尽管水旱灾害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⑫但是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依然可以遏制灾害事件的冲击破坏,将灾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盐铁论》卷 1《力耕》:“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甚至通过勤政爱民可以做到灾而不害。《盐铁论》卷 6《水旱》曰:“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寡功节用,则民自富,如是则水旱不能忧,凶年不能累也。”政治清明,天下安定,政通人和,则会无灾无害。《盐铁论》卷 7《执务》:“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赋敛省而农不失时,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同样的道理,国家政治一旦出现问题,人水关系也会恶化,水旱灾害也就不可避免了。《盐铁论》卷 7《执务》曰:“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

昭帝时期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开会讨论盐铁专营和平准均输问题,期间议题多样,除了论述水情与国情的关系之外,但凡议论经济国事、甚或社会问题也多以水旱立论。昭宣之世,人水关系的紧密顺畅由此可见一斑。《盐铁论》卷一《力耕第二》借水旱灾害强调均输平准的重要性:“昔禹水汤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汤以严山之铜,铸币以赠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廩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盐铁论》卷三《园池第十

① 《汉书》卷 27《五行志》。

② 《汉书》卷 7《昭帝纪》。

③ 《汉书》卷 7《昭帝纪》。

④ 《汉书》卷 24《食货志》。

⑤ [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 30《读左传国策》:“汉武报仇,开边费多,聚敛尚非得已,天亦谅之。故昭宣中兴。”

⑥ 黄富成:《汉代农业制度与农业文化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308 页。

⑦ 《汉书》卷 69《赵充国传》。

⑧ 《汉书》卷 69《赵充国传》:“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

⑨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⑩ 《汉书》卷 29《沟洫志》。

⑪ 《盐铁论》卷 9《论灾》。

⑫ 《盐铁论》卷 6《水旱》。

三》以水情比喻国情：“水有獭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盐铁论》卷六《授时第三十五》以水之散布四方对照财物之巨量富有：“夫居事不力，用财不节，虽有财如火水，穷乏可立而待也。”《盐铁论》卷七《执务第三十九》利用溪流入海的自然现象解释品德修养中积渐所至的重要意义：“故土积而成山阜，水积而成江海，行积而成君子。”

三、元成时期的人水关系及陈持弓事件

汉元帝刘奭是西汉衰落的标志性人物，宠信佞臣，“易欺而难悟”^①，“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②。元帝在位期间屡有水灾发生，江河泛滥，海水内侵，黄河也决口改道。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五月，渤海水大溢。”^③“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④元帝永光五年（前 39 年），“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⑤同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⑥元帝建昭四年（前 35 年），“蓝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泾水，水逆流。”^⑦元帝建昭五年（前 34 年），颍川、汝南大水^⑧。

成帝继位后水灾接踵而至，“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⑨不但三辅地区洪水杀人，引发长安混乱和陈持弓事件，黄河也泛滥决口，“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兗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⑩西汉时期的人水关系至此已经处于严重失控状态。水害为大，人力愈加微弱。成帝虽然于河决金堤之后旋即改元，年号河平^⑪，但河平年间河水泛滥决溢又有发生。河平三年（前 26 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⑫河平四年（前 25 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⑬

元成时期的水害肆虐为陈持弓事件的发生营造了必然的人水环境，元成之际的水利不修则是陈持弓事件的潜在根由。元帝时虽然也有一些水利工程建设活动，如南阳召信臣兴建六门闸，但再无武帝时期大兴水利的恢弘举措，也没有昭宣之时拓边垦殖的水利开发，水利不修几成国家常态。淮河水利兴起于武帝时期，“汝南、九江引淮”^⑭，建起鸿隙大陂发展稻作生产，“郡以为饶”^⑮，但是成帝时期因为汝南多次发生水灾，翟方进以为陂池蓄水造就水害，故此下令毁陂开田，“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

① 《资治通鉴》卷 28《汉纪二十》。

② 《宋史》卷 336《司马光列传》。

③ 《汉书》卷 26《天文志》。

④ 《汉书》卷 9《元帝纪》。

⑤ 《汉书》卷 9《元帝纪》。

⑥ 《汉书》卷 29《沟洫志》。

⑦ 《汉书》卷 9《元帝纪》。

⑧ 见《河南通志》，转引自《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气象出版社，1985 年，第 14 页。

⑨ 《汉书》卷 85《谷永杜邳传》。

⑩ 《汉书》卷 29《沟洫志》。

⑪ 《汉书》卷 10《成帝纪》：“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河决东郡，漂流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

⑫ 《汉书》卷 29《沟洫志》。

⑬ 《汉书》卷 10《成帝纪》。

⑭ 《史记》卷 29《河渠书》。

⑮ 《汉书》卷 84《翟方进传》。

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①

西汉时期的人水关系在元成之际发生了根本性反转,水害之议甚嚣尘上。刘向为元帝、成帝时期官员,奢谈五行灾异。刘向著有《洪范五行传》阐述灾异理论,班固《汉书》多有采纳。至于水灾与国家的关系,刘向以五行之中土居中央,象征帝王宫室,帝王俭约则勤政爱民,土得其性;“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孰,是为稼穡不成。”^②在《别录》中也有灾异述说,专论水害:“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成帝也因此于鸿嘉二年(前19年)下诏自责,将风雨和时与政治清明相对应,水旱之灾与治国无方作表里:“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谷用成,众庶乐业,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於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③

陈持弓事件虽然发生于建始三年,但根由在于元帝时期人水关系的日益严苛。元帝时郎官京房上书针砭时弊,“‘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④元帝继位以来,虽然灾异之后多加抚恤,“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⑤,期望达到圣贤之治,但怎奈“灾异并臻,连年不息”^⑥,昭宣之世风调雨顺的局面一去而不返,“岁比灾害,民有菜色”^⑦。究其原因,或在于元帝本性喜用儒生而弃用王霸之道^⑧,更弦改张,坏了汉家制度;或在于汉代末年气候由暖而冷的显著变化,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三月,“雨雪,陨霜伤麦稼”^⑨,“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⑩,冷期气候条件下灾害更加易于发生且造成严重灾情^⑪。但元帝本人的作为难辞其咎,对此他自己也有清醒认识:“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⑫元帝也认识到政令不通是导致国家治理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⑬。百姓生计日益艰难,即使昔日三辅富庶之地,于今也日渐贫寒,“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⑭

陈持弓事件发生于长安宫中,其肇端则在建始初年的长安三辅有所显现。成帝继位后,灾异屡现,适当西汉灾异感应大行其道之时,建始初年的频繁灾害使成帝反复自检忙于应付,也对长安城中的民心稳定必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据《汉书》卷10《成帝纪》记载,建始元年至三年期间的灾异事件就有

①《汉书》卷84《翟方进传》。

②《汉书》卷27《五行志》。

③《汉书》卷10《成帝纪》。

④《汉书》卷75《京房传》。

⑤《汉书》卷9《元帝纪》。

⑥《汉书》卷9《元帝纪》。

⑦《汉书》卷9《元帝纪》。

⑧《汉书》卷9《元帝纪》:“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⑨《汉书》卷9《元帝纪》。

⑩《汉书》卷27《五行志》。

⑪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国科学(D辑)》1998年第4期。

⑫《汉书》卷9《元帝纪》。

⑬《汉书》卷9《元帝纪》。

⑭《汉书》卷9《元帝纪》。

数起之多。“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庙灾”,“有星孛于营室”,成帝因此也惴惴不安,下诏自省,“乃者火灾降于祖庙,有星孛于东方,始正而亏,咎孰大焉!”紧随其后又是异常天象和反常现象接连出现,“夏四月,黄雾四塞”,“六月,有青蝇无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成帝再次有感于灾异以求自省,“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九月戊子,流星光烛地,长四五丈,委曲蛇形,贯紫宫。”“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是日大风,拔甘泉峙中大木十韦(围)以上。”成帝不得不对灾异有所行动,除了往日的自责自省下诏应对以外,开始关注民生,“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建始二年灾情依然如故,“二月,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①“三月,北宫井水溢出”,随后“罢六厩、技巧官。”^②“夏,大旱。”建始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③

成帝继位之初,朝中大臣的斗争就借机开始。国家政治的错误过失就会直接导致灾异发生,即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指出的那样:“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以汉家气象而言,宫室内乱,朝堂倾轧,都属于咎征系列。按照《尚书·洪范》的解释,咎征的表现是阴晴寒热风雨的失时与过度变化,其中之一即为水象:“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政治乱象的咎征与水有关之后,有感于动荡不安的时世局面,人们难免焦虑担忧大水害人的潜在风险。“咎及于水,雾气冥冥,必有大水,水为民害。”^④元帝时期因为重用石显、匡衡等一班佞臣,政治错乱,民心不稳,元帝多次问诸灾异也不了了之。待成帝即位就有朝臣和地方官员上疏备陈时弊,锋镝所向直指石显、匡衡等人。《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元帝崩,成帝初即位,迁显为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失倚,离权数月,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满不食,道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长安谣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石显去后,匡衡亦未能幸免于黜免结局。建始元年,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⑤紧接着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以阴阳五行解说夏四月发生的黄雾弥天灾害事件,“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言事者多以为然。”^⑥外戚王凤任职大将军,也因此提出辞职请求,“凤于是惧,上书辞谢。”^⑦这种宫廷政治环境下的大臣斗争虽然是一种封建王朝的常态现象,但在建始元年、二年间互相倾轧的朝政斗争背后,更多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错乱已然病入膏肓。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陈述行政弊端,“吏多苛政,政教烦碎”^⑧,是时政主要症结,因此“夫人道不通则

① 诏举贤良方正乃西汉灾异应对的国家政策之一,宣帝以后屡有施行。《汉书》卷8《宣帝纪》在本始四年“今岁不登”之后,诏令天下的救灾应对措施中就有此举措:“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宣帝地节三年十月下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

②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七上》:“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师古注:“《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驸马、骑马、辂、大厩也,马皆万匹。据此表,大仆属官以有大厩、未央、辂、骑马、驸马、承华,而水衡又云六厩技巧官,是则技巧之徒供六厩者,其官别属水衡也。”上林苑乃皇家园林,罢省属官也是灾后皇帝自省之举。

③ 赦免刑徒,类似于荒政十二“缓刑”之举。蠲免缓征租赋,也类似于荒政十二之“薄征”一项。

④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3《五行逆顺》。

⑤ 《汉书》卷76《王尊传》。

⑥ 《汉书》卷98《元后传》。

⑦ 《汉书》卷98《元后传》。

⑧ 《汉书》卷83《薛宣传》。

阴阳否隔,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①苛政之下,三辅长安有危如累卵之势,民心不稳几乎呼之欲出。

长安三辅的社会形势异常严峻,元成之际的人水关系极其紧张,当此之时,建始三年水灾发生后,关中民众已如惊弓之鸟,民惊恐上城也罢,陈持弓入宫也罢,成帝惊慌失措也罢,在看似偶然的社会动乱事件之外,其中潜伏着必然的社会运行规律。也因此,陈持弓事件之后,南山群盗起而作乱,为害一方,穀下不得安宁,虽然只有数百人的队伍,却使得皇帝大为头疼,派遣数以千计的官兵围剿也未能奏效。“南山群盗繇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拜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将迹射士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②繇宗作乱,可与陈持弓事件互为参照,才能理解成帝时期的一场水灾何以造成京师长安的社会动荡。

[参 考 文 献]

- [1] 王子今,吕宗力.论长安“小女陈持弓”大水讹言事件[J].史学集刊,2011,(4).
- [2] 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J].历史研究,2003,(2).
- [3] 王绍东,张玉祥.五德终始学说中的水德与秦汉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4).
- [4] 卜凤贤,张琳.汉武帝经营关中水利的意义[J].中国农史,1998,(4).
- [5] 喻曦.西汉京畿地区城市规模初探[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3).
- [6] 卜凤贤.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灾害变化与灾荒关系[J].中国农史,2014,(6).
- [7] 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8] 黄富成.汉代农业制度与农业文化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9]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J].敦煌研究,2001,(3).

~~~~~  
(上接第 43 页)

期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但这一认知必然面临的质疑在于:其一,若论农业对象的多元化程度,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北方地区两大区域彼此相当,但何以具有王朝形态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只产生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而并未产生于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其二,上文中陶寺遗址放养绵羊的生产方式与原有的种植业生产之间存在非兼容性所导致的后果又似乎为这一认知提供了一个不得不思考的反例。因此,在探讨农业发展与早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需要更为深入地关注农业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塑造能力,农业对象多元化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兼容与否是农业对早期文明形成产生促进还是阻滞作用的关键性因素。

### [参 考 文 献]

- [1] 胥刚,等.黄土高原农业溯源[J].草业科学,2015,(10).
- [2] 樊志民.试论中国中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萌芽[J].中国农史,1993,(2).
- [3] 杜水生.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2007,(2).
- [4] 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J].考古,2005,(10).
- [5] 罗运兵.试论我国早期家猪饲养的方式与规模[J].农业考古,2008,(4).
- [6] 孙永刚.栽培大豆起源的考古学探索[J].中国农史,2013,(5).

---

①《汉书》卷 83《薛宣传》。

②《汉书》卷 76《王尊传》